

乡村手工艺传统的现代命运*

——评邓纳姆著《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

王佳鹏

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的传统手工业，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在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处境下生存、发展和繁荣？这几乎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共同论题，也是经济人类学家邓纳姆（Stanley Ann Dunham）的关怀所在。她在《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以下简称《困境》）一书中，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从国家干预政策、行业发展、产业聚集地及铁匠日常生活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印尼乡村铁匠业的现代命运。

一、乡村手工业的现代命运：对经济二元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

在印尼进行了将近 14 年（1977 - 1991）的人类学研究后，邓纳姆于 1992 年完成了她长达 1000 多页的两卷本博士论文，题为“印尼的农民铁匠：在困境中生存与繁荣”。但不幸的是，她在 1995 年就过早去世了，她的导师和朋友继续完成了对其博士论文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而形成了《困境》一书。仅就内容和篇幅而言，该书可能只是其博士论文的一半而已。按照铁匠业的角色分工，也许我们可以将邓纳姆比作铁匠师傅，而两位编者则是锉磨工人。只是铸造这把知识之剑要远比任何宝剑都更费时费力，历经十多年才初具雏形，又过了十多年才最终问世。

该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印尼乡村手工业的现代命运，即乡村的非农业活动或“手艺世界”（craft world）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尤其是其如何受到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George, 2010: 255）。尽管各章之间关联紧密，但由于是编著，

* 原书题为 *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2009 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每一章几乎都可以独立成文。实际上，每一章都是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政府、村民、合作社、市场等各种力量在印尼乡村手工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当时，有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以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 H. Boeke）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经济二元论和现代化理论，而这两大名家正是邓纳姆在该书导论中树立的理论对话对象和批判靶子，后面各章主要就是从不同方面来具体说明和论证对伯克、格尔茨的批评。

经济二元论、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当时多数社会科学家的共识，而且也是印尼官员及普通大众的认识基础。从未到过印尼因而主要依赖二手资料对印尼经济进行研究的荷兰经济学家伯克认为，印尼殖民社会及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其二元性：乡村与城市之间、东西部之间、本土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排成了一个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时空序列。并且，印尼农村的落后主要源自其文化贫困，因为印尼农民具有跟西方社会完全不同而又根深蒂固的落后的生活态度和经济心态。而且，越是落后地区，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宗族等群体的交织和混杂就越是严重，这阻碍着“团结统一”（solidarity）的有组织经济群体的形成（Boeke, 1942: 8 - 13）。于是，印尼农民及其传统文化应该为自己的贫穷落后负责，而不应该将其贫困归咎于其他的外在原因。

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印尼的生态变迁过程》一书，则是伯克经济二元论的某种翻版。通过精细化而非效率化来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同时又不降低人均收入的过程被称为“自我挫败过程”（self-defeating process），被格尔茨（Geertz, 1963: 80）视为“农业内卷化”。格尔茨在该书中指出，荷兰殖民政权的经济需求是印尼必须面对的外部压力，人口的快速增长则形成了印尼的内部压力，这种内外压力起到了强化而非改变传统农业方式的作用。尽管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卷入了精耕细作之中，但由于缺乏创新和多样化的经营策略，平均产量却并未得到较大提高。而且，印尼农民仅仅满足于填饱肚子和继续占有传统土地，爪哇社会的此种过度稳定性使其难以做出适应当前发展潮流的任何改变（Geertz, 1963: 126 - 129）。于是，在印尼农村中，乡村工业的重要性远远不如水稻、蔗糖等传统农业，因为工匠们不关心效率和利益的增长，最多关注的只是可靠而无风险的补充性收入。现代化理论是经济二元论在线性时间观方面的继续发展，认为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主要在于其传统的文化差异，并且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以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为楷模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对于邓纳姆来说，这些理论实际上是将殖民时期形成的有关爪哇社会的迷思（myths）当成了永恒真理，而且她极为强调，以伯克和格尔茨为代表的此种刻板印象或西方偏见，对印尼政府和普通人民起到很大的误导作用。二元论过于强调印尼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地区落后的根源，因而忽视了印尼农民同样具有的理性能力，也忽视了印尼社会中生产资源的分配不均。邓纳姆（2013：2）抓住了一个显而易见但却经常被忽视的重要事实：“村民们倾向于从事他们认为最能获利的经济活动。”因此，爪哇农民并不像伯克和格尔茨所认为的那样缺乏企业家精神，相反，他们也都极为看重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爪哇穷苦农民对时间和资源的理性管理方式，与西方并没有根本差异，这也是他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她尤其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是导致农村中各种分化的根本力量，印尼乡村经济发展之所以困难重重，并非由于村民缺乏理性能力、经济盈利动机和企业家精神，而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只要具备充分的资本，印尼农民的理性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就可以得以发挥，印尼乡村工业就会得到很大发展。至于资本和资源的分配不公，一方面体现为乡村政治精英的团体化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勾结，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国家政策制定上缺乏对铁匠工人的考虑。因而分配不公主要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解决方案的根本则并不在于文化变革而在于政治经济改革。^①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尽管邓纳姆强调印尼乡村铁匠业的政治阶级结构，但她同时也认为农民具有很大程度的能动性，完全能够把握住发展机会，接受新技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进而促进和支持社会变革。

总之，伯克和格尔茨的经济二元论和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对经济问题的文化解释，而邓纳姆的研究则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或者说是经济的政治解释。正如邓纳姆多年的朋友、人类学家德夫（Dove，2010：451）所言，邓纳姆的焦点是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为人类学家，她在具体研究中特别看重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因而其所研究的乡村铁匠或乡村铁匠业深深地嵌入在村庄生活和世界体系之中，一方面该书描述和分析了乡村铁匠业是如何跟乡村内部的福利获取、社会分层、政治支配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还重点论述了乡村铁匠的生活世界是如何嵌入民族、国家、全球网络之中的（Boellstorff，2011：355），尤其是乡村铁匠和乡村铁匠业是如何在这种双重嵌入中克服外在压力和经济挑战的。作者

^① 具体可参见该书第六章有关发展项目的经验总结和政策建议。

研究的那段时期，也正是苏哈托领导的新秩序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期（1966 - 1998），虽然人权受到很大限制，但农业发展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是以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为代价的。这一点也体现出了邓纳姆跟伯克、格尔茨的差异，后者认为印尼农民都处于共同贫穷状态，邓纳姆则指出印尼农村早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社会分化，并在20世纪70、80年代乡村工业的繁荣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扩大。

当然，邓纳姆对二元论的反驳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邓纳姆以印尼农民的逐利倾向来反驳二元论学者，认为印尼农民同样具有和西方人一样的理性能力。但问题在于，此种日常生活中精打细算的实践理性是否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是一回事呢？至少，在韦伯（2010：10 - 11）看来，理性经营的资本主义仅是西方社会的“本质要素”和“特殊性格”，而其他社会尽管也存在功利心和营利欲，但其理性的程度、类型和重要意义却并不相同，尤其是未能激发“具有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之市民的经营资本主义的形成”。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尽管该书将荷兰经济学家伯克的经济二元论视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挑战对象，但是由于其对现实状况及政策制定的特别关注，而使邓纳姆没有充分把握荷兰有关印尼的各种研究，因而该书缺乏一定的历史纵深（Ricklefs, 2010：564）。

二、人类学的思想姿态与社会关怀：格尔茨与邓纳姆的分歧

邓纳姆不仅反思和批评了格尔茨所代表的二元论，而且在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思想姿态方面，她也并未追随格尔茨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类学大师。格尔茨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经济人类学向象征人类学或阐释人类学的转变，邓纳姆在书中虽然主要是跟格尔茨早期的经济人类学思想（以《农业内卷化》一书为代表）进行对话和论辩，但显然她也并不太认同格尔茨后期的阐释人类学和反思人类学。

格尔茨的人类学研究对于最初的两代印尼研究学者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邓纳姆从事研究的时期也正是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鼎盛期。阐释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因而每项具体研究都旨在“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格尔茨，1999：5）。于是，多数人类学家以及受格尔茨影响的其他印尼学者都在进行着细致入微的民族志深描，反思人类学家在田野情境中的研究立场。

邓纳姆则并非如此，她很少在书中以第一人称进行民族志叙述。其实，该书并不像是一本严格的民族志著作，全书的重点内容是铁匠师傅、五金商人及外部力量的影响，较少详细描述锉磨工等下层工人的生活状况，对铁匠手工艺的生产过程及具体细节也没有给予重视。另外，就研究对象的性别而言，也许因为邓纳姆曾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一项有关“爪哇乡村工业中的女性工作”的研究，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铁匠业中的男性世界，很少讨论乡村铁匠业中的女性及其劳动，仅在第二章中有一小节题为“女工及童工的雇佣”。

可见，她对乡村手工业和农村贫困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实际上是“逆潮而行”。“邓纳姆写作这部著作的时期，正值经济人类学对印尼研究影响日益衰落的时期，当时以政治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并不为世人所推崇。”（海夫纳，2013：313）这一方面是由于苏哈托的专制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使很多印尼学者关注的焦点都从政治经济转向文化象征（Dove，2010：452），另一方面是源自格尔茨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他的“文本转向”（textual turn）和“深描”方法。但无论是面对学术权威还是政治威权，邓纳姆都极为勇敢，她“没有追随学术潮流，而是忠于研究项目所必需的多样生动的研究方法，竭力向权力拥有者和决策者揭示真理”（海夫纳，2013：314）。

如果借用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又译雷德菲尔德）有关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或许可以说，无论是人类学的思想立场，还是说研究的对象和倾向，邓纳姆都是站在小传统一方。为了反对“独立自主型的文化系统”这种观念，芮德菲尔德（2013：91-95）认为任何文化都存在主流精英主导的大传统和底层自发形成的小传统，二者并非自给自足的独立体系，而是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相对而言，人类学的大小传统则分别指阐释人类学和实用人类学，而印尼农村的大小传统则分别指农业和非农业。也就是说，邓纳姆以人类学的小传统来研究印尼农村的小传统，以此来补充和纠正人类学的大传统对印尼乡村研究的不足。其实，格尔茨和邓纳姆所研究的都是身处“城乡连续体”（芮德菲尔德的概念）或现代市场网络下的乡村农业和乡村手工业。格尔茨等学者研究的主要是水稻村的水稻、蔗糖等农业生产活动，而邓纳姆研究的则主要是铁匠村的铁匠生产活动。因此，邓纳姆在文中对格尔茨的很多批判和否定，其实应该是她的乡村工业研究对格尔茨乡村农业研究的补充和纠正。比如对于人类学家怀特所提出的“多重职业”（occupational multiplicity）这一现象，格尔茨认为农业之外的其他副业对农民只是补充性收入，而邓纳姆则指

出，铁匠村的工业收入要高于农业收入（邓纳姆，2013：32、306）。但这似乎并未完全驳倒格尔茨的理论，而很可能情况是，水稻村中农业之外的副业主要是补充性收入，而在铁匠村则以工业收入为主要收入。

不过，这当然不是说邓纳姆完全不关心经济和物质之外的文化层面，她其实也涉及不少非经济方面。她认为文化与经济是彼此联系的，但她对文化和仪式的分析是为了从更全局性的视野分析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对仪式及其神秘力量本身的关心。第三章及第二章的一部分主要就是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因而也最具人类学特色。第二章题为“金属制造业的社会经济组织”（The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Metalworking Industries）^①，讨论的是印尼乡村金属制造业这个行业是如何在社会、经济中被组织起来的，尤其是爪哇农村铁匠是如何使用他们的技艺的。第三章则是以卡亚村这个铁匠村为田野地点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同时结合了铁匠业的实践层面和文化象征层面，铸造铁器和民间仪式一起构成了整体的传统铁匠文化。比如卡加之泉，同时也是祈雨之地，这象征着铁匠的力量跟季节变化之间的联系；再如，马来剑的制造过程也充满了神秘仪式，否则就无法赋予其以神力。可见，邓纳姆虽然不是严格的民族志学者，但正是这种田野研究的实际经验，让她对于传统物质文化保持了不被乡愁所束缚的敏锐感（nostalgia-free sensibility），使她认识到：“传统技艺并未消亡，它既没有跟宏观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脱离联系，也不是繁荣与发展的障碍。”（George, 2010: 256）

因此，邓纳姆更为重视应用人类学、公共人类学，或者说是“真实世界的人类学”（real-world anthropology）（Ricklefs, 2010: 564）。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她，从未担任过任何学术职位，而主要是在诸如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各种国际组织及其发展项目中工作，她还是印尼小额信贷领域方面的公共政策专家。对邓纳姆来说，她的学术分析主要就是为政策服务的。尽管学术研究既可能有利于殖民者，也可能有利于反殖民者，但邓纳姆坚定地站在弱者一方。因为她是非常具有道德责任的人类学家，想要通过其研究而提出实用的政策方案，以帮助那些无助而又无权的人们。人类学家乔治（George, 2010: 257）在总结邓纳姆的贡献时指出，邓纳姆的研究工作要早于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批判性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围绕着福柯有关权力与治理术的论述而展开的；但是，“现在，也许我们在进行阅读和研究时，确实需要有

① 原译为“金属制造业的社会经济结构”。

某种与众不同的分析性敏感 (analytic sensibility)。然而，邓纳姆那艰辛万分而满怀激情的研究，却给我们这些想要给那些实用的、满怀激情的问题解决者（无论他们是在村庄、政府部门还是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留下点有用遗产的人以持久的教益”。

三、邓纳姆的影响与价值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想必都可以在现实与事实中得到某种检验，在该书的后记中，海夫纳介绍和讨论了自邓纳姆去世后印尼社会与印尼研究的变化，并指出邓纳姆敏锐地把握住了印尼社会变化的趋势。他指出，邓纳姆有关印尼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发现基本得到证实，“高地地区农业资本化发展将最贫穷的乡村地区变成了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商业繁荣也引来了政府项目，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政府对乡村精英的扶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道路建设、旅游、灌溉工程、工业商业化、公共教育的发展使这一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他较基杜尔地区距离印尼大型工业和农业产业园区更近的地区更是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海夫纳，2013：309 - 311）

海夫纳（2013：310 - 313）还指出，尽管邓纳姆研究极为严谨，但她似乎还是低估了当时正在发生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比如，邓纳姆在研究中认为她所研究地区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并不十分严重，而且乡村的上层人士都很俭朴友善，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商业化却严重地加剧了爪哇的阶级分化。再如，邓纳姆研究时期伊斯兰教被大力清除，因而她认为当地很少有伊斯兰教活动，但她并未想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伊斯兰教再度获得复兴，而无论是伊斯兰教的被打压还是再度复兴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

正是海夫纳所指出的邓纳姆研究的这些不足，提醒我们时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犹如邓纳姆对于伯克和格尔茨的批评一样，海夫纳看到了邓纳姆的部分不足。如果将时间和历史阶段考虑进去，那么，伯克和格尔茨的二元论可能部分地符合20世纪60年代之前印尼农村的实际，此后苏哈托政权开始实施的现代化政策则可能改变了传统农村而使其乡村工业得到发展，邓纳姆研究的正是这一时期。因此，邓纳姆对伯克、格尔茨等人的二元论的批评，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纠正，而且主要是后半世纪的印尼研究对前半世纪印尼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跟二元论相对，邓纳姆所坚持的似乎是一种一元论。二元论的现代化理论认为

他者性是落后之根源，只有学习西方并成为西方，才能实现其发展。邓纳姆的一元论则认为，印尼和西方本来就没有实质差异，都具有理性的发展能力。但无论是伯克和格尔茨的二元论，还是邓纳姆的一元论，似乎都认可资本主义这一发展路径，分歧仅仅在于印尼农村是学习西方而走向市场化，还是发掘出自身就有的理性能力而走向市场化。可见，二者都未考虑到多元现代性或多元现代化的可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邓纳姆认识到了印尼乡村工业的发展趋势，但却并未完全认识到印尼乡村工业市场化的后果。如邓纳姆的政策建议那样，政府、国际组织、各种企业等力量对乡村工业的资本投入，虽然使乡村工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却导致了问题更严重的阶层分化，而不是如邓纳姆曾认为的那样，农村精英分子都很和善，为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多数村民的生活，可以允许农村社会分化的存在。

国外和国内有关发展的反思已经汗牛充栋，邓纳姆自己并不完全认同的批判学派将发展视为“幻象”，认为发展主义是意识形态（许宝强，2001：1-30）。这个莫衷一是的宏大问题，并非是这篇书评所能澄清和解决的。还需指出的是，该书除了对印尼地区、发展研究的影响之外，还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而使其对美国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该书英文版封面上，高调地写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的人类学研究著作”。除了作为出版社的营销策略外，相信任何读者也都确实会对邓纳姆跟她的总统儿子多少有些好奇。对于我们来说，与其好奇地关注邓纳姆跟她的总统儿子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之间的奇闻逸事，不如认真地思考作为人类学家母亲的邓纳姆如何影响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长及其执政理念。甚至有人类学家半开玩笑地说，奥巴马的当选，其实是人类学的胜利。

作为人类学家和发展项目专家的邓纳姆，其艰辛而勤奋的工作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子女的照顾。^①但这也使作为她儿子的奥巴马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种人类学意识，因而有些人类学家笑称奥巴马是一位“根本上的人类学家”（organic anthropologist）（Comaroff，2008）。邓纳姆对底层的倾听和观察，尤其是从底层对社

^① 有人类学家以切身体会为基础，指出邓纳姆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外的公共人类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需要在家庭、学术界、社会服务、政策圈子等不同领域之间不断切换，而不只是像学院派人类学家只是在家庭和田野之间奔波，此种生活很是艰辛（Boellstorff，2011：355）。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媒体和大众有关邓纳姆在子女照顾上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既有人因邓纳姆坚持早起教儿子英语而大加赞扬，也有人谴责她去进行田野工作时“抛弃”儿子。

会变迁进行综合性思考，是她传授给奥巴马的最佳态度（Dove, 2009; Boellstorff, 2011）。在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他的母亲被刻画为具有“自由精神”（free spirit）和“道德基石”（moral bedrock）的理想楷模。除了思考态度和精神气质之外，邓纳姆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奥巴马，比如有人认为，邓纳姆在苏哈托独裁政权下坚持进行自由研究，深深影响了奥巴马对于权力和自由的认识（Hoskins, 2010: 80）。

美国人曾很焦虑地认为奥巴马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也许正是因为浓厚的人类学意识，而使奥巴马能够一定程度地克服美国人的本土身份意识，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几乎一生都是跟“他者”生活在一起的，奥巴马也经常随着他的母亲生活在“他者”的生活中，所以这种人类学意识不仅让他理解和接受了他双重的种族血统和文化传统，而且也使他跟他的母亲一样认为：“那些他者跟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Dove, 2010: 453）就此而言，邓纳姆跟格尔茨也许是一致的，因为格尔茨（Geertz, 1973: 14）曾言：“人类学的宗旨便是扩展人类话语世界（the universe of human discourse）。”

邓纳姆的人类学思考尽管对奥巴马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似乎也有些夸大，这一方面是出于美国政治宣传策略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部分人类学者对奥巴马作为人类学家儿子这一身份的过分阐释。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每位对《困境》一书做出严谨评论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本著作本身就有其重要价值，而不是因为作者是美国总统的母亲。该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邓纳姆通过对印尼农村铁匠业的扎实研究，对以伯克和格尔茨为代表的二元论进行了反思和反驳；以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和道德责任，致力于公共人类学的实践和运用，在认识真实世界的同时努力改变世界，尤其是维护和提升无权者的权益；而且，印尼农村确实因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而发生了一些积极的改变。

参考文献：

邓纳姆，2013，《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徐鲁亚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格尔茨，1999，《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海夫纳，2013，《安·邓纳姆，印度尼西亚，人类学——一代人的故事》，邓纳姆《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徐鲁亚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芮德菲尔德，罗伯特，2013，《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许宝强, 2001, 《发展、知识与权力》, 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幻象》,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韦伯, 201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Boeke, Julius Herman 1942, *The Structure of Netherlands Indian Econom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Boellstorff, Tom 2011, “Crafting Indonesia, Crafting A Legac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3 (2).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Y: Basic Books.
-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aroff, John 2008, “This Pariah-to Messiah Moment: John Comaroff.” *Open Source Blog Archive*, November 11.
- Dove, Michael R. 2009, “Dreams from His Mother.” *New York Times*, Op-Ed article, August 11.
- 2010, “Review of 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3 (2).
- George, Kenneth M. 2010, “Review of 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 *Museum Anthropology Review* 4 (2).
- Hoskins, Janet 2010, “The Keeper of the Kris: Review of 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 *Anthropology Now* 2 (2).
- Ricklefs, Merle C. 2010, “Review of 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1 (3).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张 帆